

# 日子，不仅仅是跑车拉货

## 货车司机演唱会，唱出了新生代务工者的新梦想

本报记者张璇、林光耀

奔波在城市里的货车司机，大多是身在异乡的拼搏者。在杭州，有这样一群“会玩”的货车司机，他们给又苦又累的日子加了点“糖”。一辆货车两盏灯、一台音响几个人……在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里，车厢变成唱歌的舞台。伴随音乐响起，他们在异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 唱歌时，就觉着日子不仅仅是跑车拉货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90后”李吉和“00后”孙浩，在演唱会上合唱了《突然的自我》。

诚如歌名，这个夜晚，主唱的7位货车司机拥有了“突然的自我”。

这场特殊的演唱会，开在了杭州半山森林公园停车场，一辆4.2米长的旧平板货车成了他们的舞台。

“大家晚上好，我叫刘东方，来自河南周口。这是我的货车，也是我的舞台。”从驾驶室跳下，缓缓绕车一圈后，演唱会发起人之一——货运司机刘东方跳上平板车说了开场白，他的身份在不经意间切换。

白天干完活，32岁的刘东方晚上回家会自己烧饭、洗衣服，躺在床上听歌、刷抖音，“有时候也爱自己唱。唱歌时，就觉着日子不仅仅是跑车拉货，如果生活没味道，就找一找滋味。”

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因为跑车拉货在杭州相识，也因为志同道合，唱在了一起。

李吉是湖北人，初中毕业后去广州做过服装，2015年带着老婆来杭州打拼，3年前考到驾照，做起货车司机。

在车里，李吉想怎么唱就怎么唱，这种感觉很自由。而在大多数不跑单的夜晚，李吉会选择不花钱的方式来过瘾：对着手机App唱、洗澡的时候唱、给孩子唱……当然，情歌也很少给老婆唱。

在演唱会上，李吉选了刘德华的《今天》。“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尝，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这是《今天》的歌词，也是李吉在外摸爬滚打多年的心境写照。

孙浩是演唱者里年纪最小的。演唱会前，他还抽空开着自己的小面包车去拉了一趟活，10多公里，赚了100多块。

虽说布置简单，但这场演唱会也还有模有样。17首曲目现场献演，台下最小的观众不足1岁，年纪最大的，已是满头白发。《涛声依旧》《水手》《你是我的眼》《追梦赤子心》……歌声让一些观众红了眼眶。抱着孙女来看演出的市民王女士说：“有些老歌唱得真有味！”

周边附近很多居民顶着闷热，点亮手机，随节拍摇摆，也为他们鼓掌。

事实上，此前10多天，在同一个停车场，同一辆平板货车上，同样是这群司机，已经自发开了一场演唱会。只是当时，刘东方花100元租的现场音响效果不理想，杭州市半山街道办事处得知此事后，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联合一些爱心企业为他们众筹了第二场演唱会。

得知要办第二场，在杭州专业从事舞台搭建活动执行的热心市民张良彬辗转联系到司机师傅，免费提供了第二场货车演唱会的音响和灯光。



▲8月18日，货车司机站在货车上合唱。 本报记者黄宗治摄

专业的音响和灯光带来了更出色的表现。“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在货车上唱歌。”张良彬是杭州青年合唱团的成员，他说这些司机唱得很“专业”，也很好听。

### 演唱会结束了，生活还是一切如常

清晨6点，闹钟响起，刘东方从睡梦中醒来。刷牙、洗脸、吃早饭，6点半出门，刘东方开始一天的工作。

夜晚的“舞台”在白天的工具，也是他的朋友。今年5月花费3万多元买回的货车，给了他生计，也陪他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调的炎热夏天。

“被忽悠了。”刘东方一阵自嘲，“这车原有的空调坏了，当时卖家说可以自己加装空调，结果去装空调的地方，人家师傅一看，车底下根本没有加装空调的空间，装不了。”

刘东方自我安慰，没空调能省下一笔油钱，就当是自己多挣了钱。但跑在杭州的夏天里，他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一次又一次。这辆二手货车车况十分一般，路面上的任何不平坦都能被放大，用刘东方的话说，“颠得肝儿颤”。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高发期，他还是一名驾校教练。驾校不复工，他在家“闲”了一段时间。身边不少老乡在杭州跑货运，在老乡的介绍下他加入了货车司机队伍。

“没落东西吧？那我开走了啊。”中午1点22分，来不及吃午饭，刘东方熟练地和货主确认了货物状态，将车驶出杭州市建华装饰材料市场。装货过程耗时35分钟，他为此支付了5元停车费。

之前打了几次交道，刘东方知道有些货主挺凶，因装货时间长产生的停车费也不太愿意给。

“碰到这种情况，你要笑着跟他好声好气地说。你笑着说，他也没脾气可发，如果跟他急了，很可能最后非但拿不到停车费，还得被投诉服务态度差。”刘东方早年是吃不得亏的人，得理不饶人，但多年外出闯荡的经历磨平了他的棱角，让他收起了锋芒。

“经历多了，就明白出来是要挣钱的，为了一点小钱搞得不开心，耽误了挣大钱就太划不来了。”刘东方说。

下午2点40分，把货物全部卸下以后的刘东方终于抽出时间吃午饭。午饭是两个馒头，就着咸菜。“不是每天都能在饭桌上吃上午饭的，所以我会买两个馒头带着，就当午饭了。”

带着一车钢跑了23公里，这一单刘东方挣了174元。“每天能有3单这样的活，我就很满足了。”但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每月他都要碰上几个订单寥寥的日子。

“尤其是周日，很多地方不上班，对平板货车的需求就会小很多。”洞悉了这个规律后，刘东方索性放弃了无谓的等待，每周日给自己也放了一天假。从晚上7点开始，孙浩不断刷新手机，查看是

否有新的订单。直到近10点，他才接到了一单价格还算不错的生意——帮一个年轻的小伙儿搬家。

“在夜里，常常车多单少。等单子无聊的时候我就看看视频，唱唱歌。”孙浩说。为了更好的音乐体验，他特意花了6000多元为自己的小面包车添置了一套专业的音响设备。

孙浩是个“斜杠青年”，白天做酒类生意，晚上做网约货运司机。17岁那年，他和朋友在老家创业，经营酒类销售生意，公司顺利起步，业绩也不错，他还用赚来的钱盘下了一个水果店。原本，他的生活轨道就是在老家靠自己努力，当个小老板，与老家姑娘结婚生子。

但生活总让人出其不意。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一些私人原因，孙浩退出了老家的生意，其他创业的项目也接连不如意，还欠下一些债务。在老家干不下去了，他就跟着在工地干活

的父亲来到杭州。来杭州的第一天，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在杭州重新证明自己。

2019年，孙浩的生意迎来了起色，但毕竟刚打入新的市场，一切都需要时间。业务员的工资和公司场地租金每月共需支出2万多元，对他是个不小的负担，而新冠疫情也影响了他的生意。

网约货运司机的工作，孙浩已经做了三个月。早的时候凌晨一两点收工，晚一点即使到凌晨四五点他也会送货。“一个月下来，能挣上六

# 他想当个好演员，而不是大明星

本报记者尹平平

“乘风破浪的，不只是我们面前的这30位‘姐姐’，还包括台下的你，也包括台上的我，我们都在各自的舞台上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在今夏热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后一期直播当中，黄晓明有感而发。

并非专业主持人出身的黄晓明，作为节目中几乎唯一的男性，贯穿始终主持了一档由女明星出演、女观众评分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黄晓明告诉记者，自己参与这档节目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欣赏并且想要传达这样一种理念：“无论男性、女性，都可以不惧年龄就要赢。”

“要去赢的不是别人，是自己。”黄晓明对记者解释说，“对于我来说，就是要突破年龄、形象、别人对我的刻板印象等等，争取在每一部电影中，都能塑造出一个好的角色。”

在这个“小鲜肉”“网红脸”盛行的年代，40多岁的黄晓明，虽然还会经常自称“晓明哥”，但是也很清楚：自己的年龄已经和个别新生代演员的爸爸差不多大了。不过，从20岁就开始当明星的黄晓明，年过40岁后，自认为确实做到了“四十不惑”——他越来越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我想当一名好演员，而不是做一个大明星。”

### 后浪袭来

年龄，似乎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事。20岁、30岁、40岁……到了某个年龄段，你就该怎样、能怎样、不得不怎样……这些在普通人生活中经常被拿出来“嚼一嚼”的话题，对于明星来说，更容易带来困扰。不仅女明星会受影响，男明星也一样。

“我仿佛每过一个10年，就会经历一场更年期。”黄晓明向记者回忆说，其中令自己曾经最为困惑的，就是35岁到40岁期间的这5年。

“此前演惯了的那些‘小生’的角色，逐渐不再给我了。”黄晓明起初有点纳闷，“那些角色，以前对我来说，可是信手拈来的啊。”当他发现是因为



▲黄晓明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饰演草根出身的英语教师成冬青。他告诉记者，在他演过的角色当中，自认为和自己最像的就是成冬青。 受访者供图

和自己年龄增长有关，黄晓明想往“老生”的方向靠靠，却发现“好像还差一些，够不着。”

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开始的学生时代，黄晓明就因形象出众而备受青睐，一上来就演主角、演皇帝，演艺事业旗开得胜。一路凯歌到35岁，黄晓明更多时候面对的都是选择太多而自己不会拒绝。面对35岁以后的变化，起初真有点不习惯。

与此同时，新一代“小生”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眼瞅着后浪汹涌澎湃，黄晓明的心理怎么会不起涟漪？

“肯定有自己的问题。”他虽然向来自信，但并没想过把责任推卸出去。自己所获的声望、荣誉和各种实打实的利益，到底是靠才华、学识和智慧在

支撑，还是全凭一张脸？黄晓明问自己。

“无论哪个领域，真正的美，都不仅仅是浮在表面的，而是有积淀、有深度、有层次的。”没有哪个演员只靠自己是帅哥或者美女，就能红一辈子。绝大多数在年轻时俊俏的脸，都会随着容颜老去被人遗忘。黄晓明不想重蹈覆辙。

### 没空焦虑

就在黄晓明在角色上迷失的那段时间，各种关于他的大小非议也接踵而至：有猜测他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有讥讽他说英文时发音古怪的。虽有些是无稽之谈，但人言可畏，黄晓明也很难做到

不往心里去。

他曾想极力解释，但发现不仅解释不清，反而像是授人以柄。他学着不听不看，可心里仍然不静。其中有一种言论尤其让他难受：不会演戏。

既然最在乎这方面，就在这方面尽最大努力。他开始做减法，再三明确自己演艺工作的核心必须聚焦在演技上。人生进入第4个十年后，黄晓明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我想当一名好演员，而不是做一个大明星。”

“明星更看重自己身上的光环，而演员更看重自己塑造的角色。”黄晓明这样向记者解释他心目中明星与演员的区别。“好的演员让你记住的都是角色，而明星只让你记住他自己。”

黄晓明总会在跟人聊演技时，不经意间提到丹尼尔·戴·刘易斯，那是他最崇拜的演员之一。“丹尼尔·戴·刘易斯演的每一部电影中形象差别都很大，但总让你印象深刻，可你甚至记不住他到底长什么样，更不会去关心那些他生活中的杂七碎八。”这是黄晓明向往的状态。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向来在圈子里被称为“老好人”的黄晓明总算学会了拒绝：拒绝那些和自己目标无关的邀约与诱惑，想方设法把更多精力花在塑造角色身上。这样才有了《中国合伙人》中的草根出身英语教师成冬青，才有了《无间道》中的深情学子陈鹏，才有了《烈火英雄》中的英雄消防员江立伟。

现在记者们再看到黄晓明，曾经那些流言蜚语虽不一定再提，但总免不了要跟仿佛“上了岁数”的他聊聊年龄焦虑的话题。黄晓明从不避讳曾经确实为此困惑过，“但我现在真的不焦虑，我没那么在乎年龄了，也已经没有时间焦虑了。”

### 孤帆远影

时间都去哪儿了？用于演戏。黄晓明向记者举例说，在《烈

火英雄》中演消防员，他跟着导演陈国辉大量

访谈出生入死的一线消防员，并且与全组演员和消防员们一起进行了1个多月的实地训练。“我想知道消防员面对生死时到底在想什么，我想自己演戏时穿的消防服浸过我训练时流的汗……我的时间精力都被这些占用了，你说我还哪里顾得上再为那些焦虑？”

也曾有导演不愿意给黄晓明尝试的机会。倒也不是专门针对他，而是觉得“帅哥都不会演戏”。黄晓明并不认为这全是偏见，但他要求自己试着突破这种观念。

很多演员都希望自己能“破圈”，不光能演戏、还能唱、能跳、能上综艺耍嘴皮；黄晓明也希望自己能“破圈”——“突破自己熟悉的舒适圈，挑战更多不同的角色。”

以前黄晓明拍戏时，倾向演好人，会请导演把自己“拍帅一点”。现在他愿意做更多尝试，丑角、反派都不排斥。在《八佰》中出演中分八字胡的特派员时，他甚至跟导演管虎说：“你把我拍丑一点吧，让观众认不出来我才好。”

尝试突破舒适圈的黄晓明并没有让自己不舒服，他告诉记者，现在的自己：“非常享受。以前我像是条战舰，横冲直撞。确实有过乘风破浪的精彩，但也被浪掀翻过。现在我更像是一条帆船，驾轻就熟，向着心中的方向远航。”

黄晓明说他已经不再需要很大的船，也不再需要很多的水手。只想和自己最在乎的人，共同驾着体量不大的帆船，在海中乘风破浪也行、优哉游哉也可以。行程和风景满是快乐，闲言碎语只当是海风吹过，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容易感到疲惫和被动。现在的他一点也不怕后浪拍过。“他们有他们的路，我有我的。”

回头看看自己的来路，黄晓明很感谢35岁到40岁那几年“更年期”的困惑。他承认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无论在职场还是家庭中，都有对应的使命，“但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的意识也好、能力也好，都应该能提供相应的环境，让各个年龄段的男男女女，除了肩负家里家外的职责，也仍然有追求自己梦想的余力，战胜自己、突破观念。”

### 再干几年看看，实在不行就回老家

李吉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想为两个女儿攒钱，“两个娃娃一个4岁，一个1岁，都是‘小吞金兽’。”李吉的老婆为照顾孩子辞职在家，房租加上奶粉每个月需要五六千元，这些都无形鞭策着李吉多跑几单。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货车演唱会那晚，李吉还唱了一首张宇的《给你们》，向妻女表白，感谢女儿呱呱坠地、妻子长情陪伴。

来杭州打拼多年，李吉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杭州为小家庭购置一套房产。老婆跟着自己那么多年，吃苦操劳，李吉想让她日子过得再好一些。“3到5年，努力工作，存足首付，买上一套房。”李吉说，买房子这件事，他是一定要办成的。

刘东方想在杭州安家。他喜欢杭州的生活气息，也适应杭州的生活节奏。但是有时候他又觉得这座城市和自己有距离感。“我希望能多挣点钱，手里有钱了，说话才能更硬气。如果能在杭州买房，才能算是在这儿真正扎根下来吧。”

看到身边的朋友陆续结婚，刘东方意识到自己要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在他的省吃俭用下，他的账户余额以每年五六万元的额度增长着。

面对杭州高昂且不断上涨的房价，刘东方有点心却步。“在杭州再干几年吧，看看有没有机会留下来，实在不行就回河南老家。”刘东方说。

孙浩的父亲是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手头也还有些积蓄。虽然现在生活条件还可以，但孙浩想靠自己能力闯下一片天地，“闯进”杭州这座城市里。

为了谋生，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货车司机们，一直奔波“在路上”，精神和文化需求也随之漂泊。在刘东方看来，歌声里藏着一个港湾，让心灵的航船能短暂停靠避风。“把委屈、不快乐宣泄了以后，心情就会变好，伤痛也会暂时被忘记。”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说，这种孤单漂泊的状态，不仅是货车司机的现实，更是城市打工者共同面临的精神文化生活缩影。尤其是这些“80后”至“00后”的新生代务工者，他们与父辈不同，对城市文化生活有了更为多元和迫切的需求。

一场特殊的演唱会，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漂泊在城市的异乡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群货车司机、杭州城北的一处停车场和“互联网之都”之上。

漂泊者们的辛酸和坚守，也在演唱会的歌声中得到了些许抚慰。